

Strategic Trade Policy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国际贸易及政策的经典之作
七次再版、经久不衰



战略性贸易政策 与新国际经济学

[美] 保罗·克鲁格曼◎主编

海闻等◎译



中信出版社·CHINACITICPRESS

Strategic Trade Policy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战略性贸易政策
与新国际经济学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略性贸易政策与新国际经济学 / (美) 克鲁格曼主编; 海闻等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0.5

书名原文: Strategic Trade Policy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ISBN 978-7-5086-1979-8

I. 战… II. ① 克… ② 海… III. ① 贸易政策-研究 ② 国际经济学-研究 IV. F710 F.1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49941 号

Strategic Trade Policy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by Paul Krugman

Copyright © 1986 by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 2010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战略性贸易政策与新国际经济学

ZHANLÜEXING MAOYI ZHENGCE YU XINGUOJI JINGJIXUE

编 著 者: [美] 保罗·克鲁格曼

译 者: 海 闻 等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 《比较》编辑室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十三区 35 号煤炭大厦 邮编 100013)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86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09-3853

书 号: ISBN 978-7-5086-1979-8 / F · 1935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264000

<http://www.publish.citic.com>

服务传真: 010-84264033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目 录

1 导论：贸易政策的新思路	1
<hr/>	
保罗·克鲁格曼	
2 战略性贸易和产业政策依据	21
<hr/>	
詹姆斯·布兰德	
3 战略性出口鼓励：一个评论	44
<hr/>	
吉恩·格罗斯曼	
4 贸易政策应该扶持什么？	64
<hr/>	
巴巴拉·斯潘塞	
5 创造优势： 政府政策如何影响半导体产业的国际贸易	83
<hr/>	
米歇尔·博鲁斯 劳拉·泰森 约翰·齐斯曼	
6 信贷政策与国际竞争	104
<hr/>	
乔纳森·伊顿	

目 录

7	新兴产业的产业政策	134
		杰弗里·卡林纳
8	警惕：日本的产业政策	153
		山村光三
9	美国的贸易和产业政策： 纺织、钢铁和汽车产业的经验	192
		威廉·克莱因
10	战略性行为和贸易政策	219
		威廉·布兰森 阿尔文·克兰沃里克
11	贸易政策的新政治经济学	233
		大卫·理查森
12	贸易政策：一个研究日程表	259
		阿维纳什·迪克西特
	译后记	281
		海闻

1 导论：贸易政策的新思路

保罗·克鲁格曼

本书中收集的论文是为一个很不寻常的研讨会准备的。在那个研讨会上，两部分平时很少直接联系的人坐到一起来了。一边是政府官员和私人企业的代表，他们对贸易政策的关心完全是从日常事务的实际问题出发的；另一边则是学术界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他们思考而不是制定贸易政策或处理有关政策上的问题。虽然一些“关心实际问题”的与会者们与学术研究也有联系，一些学术界的人士也从事商业与政府工作，然而从总体上讲，这次会议的组织者发起的是一次由来自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的人进行的研讨会。

本导论的目的在于帮助解释这样一次会议的必要性。因为这本书和这次会议一样，主要针对商界与政界人士，而非学术界人士，所以我的论文主要解释为什么贸易政策的新思路虽然有时看上去显得抽象并与现实问题脱节，但对于从事实际工作的人来说是相当重要的。此外，我还想解释一下为什么学者们需要与政策制定者或工商界人士进行交流，为什么这种交流的结果是互惠的。

贸易政策的理论与实践

从事实际工作的人往往很难认真对待抽象的理论分析。充斥于大多数



经济学文献中的公式、图表和术语似乎距离现实很远，人们经常怀疑它们是否真的有用。这种偏见并非完全没有道理。的确，学术界往往更热衷于追求理论的严谨，而不是关心它们是否与现实问题有关，更喜欢追求数学论证的精确，而不是去解决现实世界纷繁复杂的问题。但是，如果工商界与政界的领导人因此便认为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与现实无关或毫无用处因而不屑一顾的话，那么这种认识也是错误的。这是因为：第一，无论是否招人喜欢，经济学家们谈论的问题都与政策有关。认为实践中的经济政策只反映政治利益而不是理论分析的看法，虽然看上去精明实在，其实是错误的。实际上，理论分析有助于解决政策争论，其影响通常比人们普遍想象的更大。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的结尾，精彩地阐述了这一观点：

经济学家与政治哲学家们的思想，无论对错，比一般人们所认为的更有影响力。实际上，这个世界是被其他少数人统治的。那些自认为根本不受任何思想影响的实干家们，通常是某位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那些掌权的狂人，自认为他们的思想得自天启，其实他们狂妄的思想是来自几年前某位拙劣的作家。我深信，与思想的逐渐渗透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被过分地夸大了……或迟或早，不论好坏，危险的是思想，而不是既得利益。

凯恩斯的著作所产生的影响本身就是其观点的一个证明。无论正确与否，凯恩斯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提供了一个他人难以企及的清晰严谨的分析框架。40年来，凯恩斯的思想影响了全世界的政策。正如凯恩斯可能已经预料到的那样，他那个时代争论的理论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常识，以至于那些自以为只谈论实际问题的男人和女人们所使用的措辞和思想，实际上都是30年前凯恩斯主义的。

近年来，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最初来源于学术界的思想的影响。货币主义及供给学派的经济学，无论是否是有很好的理论，对它们的运用肯定

已对近来的一些实际事务产生了影响。

毫不夸张地说，理论在日常的政策制定中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每个人都知道，政府的决策会受利益集团和政治因素影响。但如果认为只有这些因素决定政策，那就极其荒谬了。一个观点的理论水平如何，并不总是决定性的，但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它却可以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任何一个参加过美国政府官方决策的人都知道，如果一些集团的政策建议有系统的和深思熟虑的分析做后盾，就可以扭转政治上的不利局势；相反，如果缺乏充分的理论依据，哪怕有强硬的政治支持，一个提案也有可能被否决。我本人在政府工作的时候，就常常看到政治考虑优先于经济分析的情况——这并不奇怪，但令人惊奇的是，有时甚至一些有强烈政治背景的政策，由于没有很好的理论分析基础而陷入困境。我听说，一家公司的一项政策建议虽然得到了工商界和政界许多身居高位的朋友的广泛支持，但一年多仍然毫无进展，主要原因是政府经济学家们能轻易地把这些提议批得一文不值。最后，这家公司请了一些优秀的经济学家为其撰写了一份很有说服力的报告，很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因素或其他一些原因，该公司最终摆脱了窘境。这里的关键是这家公司发现了理论分析的质量确实会改变提案的说服力。

一位美国高级贸易官员在谈到贸易政策的政治压力时说：“贸易保护主义者所需要的只是一个理论领袖——一个贸易保护主义的阿特·拉弗 (Art Laffer)”。在本书中，我不想指出他是谁，不过这位官员的确又一次道出了理论分析的重要性。无论一项政策背后的利益集团有多么强大，如果该提议缺乏令人信服的理论支持，也会遭遇重重困难。

至此，我只强调了我们必须重视经济分析是因为它在政策制定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也许是一个很关键、很现实的原因，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理论分析常常是正确的，它能揭示出一些不作分析时有可能被忽视的问题。我们经常认为，如果一个高水平的商人在其工作领域或行业内是一个专家，那么他在分析政策对其行业的影响方面也应是一个权威。如果政策的影响是直接的，这种认识也许是对的。但是，经济政策的许多最重要的影响往往都是间接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能透过现象得到全面认识的理论分析就变得



至关重要。经济学家们在这些方面可以有所作为，因为正是在对间接效应的分析中，理论分析和数学模型变得十分有用。下面，让我以三个贸易政策为例来说明这一观点。

第一个例子是关于农产品贸易的问题。与欧共体（EEC）农产品出口的冲突，使得美国有时也考虑运用补贴或其他优惠政策促使其他国家购买美国而非其竞争对手欧共体的农产品。这项提议的支持者通常会提出一个有关补贴可以带来额外出口的估计。这个估计是基于占领目标市场的直接影响做出的。然而，由于忽视了间接影响，这种估计通常偏高。例如，欧洲的谷物从某个市场退出，就不得不出口到另一个市场上去，除非欧共体愿意削减其出口，否则结果将是美国在其他地方失去市场，美国出口的净增长就会比预计的小。

第二个例子是有关财政预算政策和国际竞争力的关系问题。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目前的贸易赤字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财政赤字引起的，因为财政赤字使利率提高，高利率吸引国外资本流入，从而使美元升值，并造成美国竞争力的下降。这里要指出的是，影响当前美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最主要因素，来自那些并非直接针对受影响的市场制定的政策，来自那些即使对自己的行业战略十分熟悉的企业经理也可能不太理解的政策。这样就有必要进行抽象的推理，从这些特定的产业出发，理解这类政策的影响。

第三个例子来自本书的一篇论文。吉恩·格罗斯曼（Gene Grossman）在他的论文（本书第3章）中指出，出口部门不得不为了获得有限的资源（如熟练的劳动力等）而相互竞争。对一些部门的出口支持政策将提高使用这些资源的成本，从而导致另一些部门竞争力的减弱。这意味着在采取任何一种有选择性的出口鼓励政策之前，必须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哪些出口部门在边际上比其他部门更值得扶持，否则这种举措会降低生产率。

以上的例子表明，从理论上进行经济分析，对正确评估贸易政策是必不可少的。然而，经济学家提供理论分析这一事实，并不能也不该自然而然地赢得认可。我们还需要确定这些分析是否确实与现实密切相关。从这点来看，对贸易政策的传统经济分析开始显得有点力不从心。尽管大多数的经济学

家——至少包括本书的一些作者在内——仍然坚信自由贸易，然而，古典经济学中用来支持自由贸易的经济分析开始显得越来越不切实际。

一方面，这是因为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一直可以用来说明 1880 年甚至 1950 年的经济状况的古典的自由贸易理论，已不适用于解释 1984 年的世界经济。其中的原因我们会在下一节讨论。另一方面，这是因为我们对市场的运作规律有了更深的了解。无论哪个原因，关键的问题是，经济学家们可能仍然会支持自由贸易，但如果他们想保持其理论的可信性，就必须更新自己的论据。

贸易政策环境的变化

在本文的第一节，我强调了对商人和政府官员来说，理解国际贸易与贸易政策的经济分析是十分重要的。然而，本书的主题并非只是贸易的经济分析，而是贸易政策的“新思路”。在过去的几年中，经济学家分析贸易问题的方式已经开始改变。正如我们将在下文讨论的那样，这种变化可能最终导致贸易政策的变化。为了理解这种新思路的含义，首先必须弄清转变观念的原因。

我们可以举出贸易政策的经济分析发生变化的三个原因：首先，贸易在美国经济中的地位和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已经改变了；其次，国际贸易自身的特征一直在发生变化，并影响到美国和其他国家；第三，经济学领域的思想变化，尤其是在产业结构和竞争的分析中发生的思想变化，也影响了从事贸易政策研究的经济学家。

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变化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最重要的变化，是贸易的重要性稳步上升。让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数字来说明：1960~1980 年期间，进出口占美国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增长了一倍多。这种变化并不仅仅局限在量上，它说明了国际因素对美国的重要性发生了质的变化。在 1960 年，美国制造业的产品主要是面向国内消费者，企业的竞争对手主要是国内的厂商。他们



即使出口，通常也只是较次要的行为；即使有来自外国厂商的竞争，通常也是不足为患的。到了20世纪80年代，国际因素成为一个重要方面。很多企业，也可能是大多数的企业，要么严重依赖出口，要么在美国市场上面临外国企业的激烈竞争。

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我们在贸易政策方面的观点的呢？最主要的影响是：它把以前一直被认为是纯国内性质的问题转化为一个把贸易政策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的问题。尤其是在处理市场控制力、超额回报率以及创新和技术变革等问题时，我们都不能不慎重考虑贸易政策。

首先考虑市场控制力问题。在只有少数企业集结的行业中，美国传统的政策是限制公司，以牺牲消费者利益为代价，抬高价格和赚取超额利润。如今美国已成为一个贸易大国，政策目标就复杂化了。一方面，政府仍然要保护消费者免受剥削；另一方面，在有高收益的情况下，还要考虑让本国厂商保持并扩大在这些高收益中的份额。正如从本书中将看到的那样，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只有少数企业集中的产业中，贸易政策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增进本国厂商的利益。或者，我们至少应该关注外国政府是否有可能采取这种贸易政策来促进该国这类产业的厂商的发展。

接下来看看创新与技术变革的问题。美国在这方面的政策是鼓励企业进行像基础性研究一样能在经济中其他部门产生有价值的技术外溢的创新活动。这方面之所以成为一个贸易问题，是因为美国现在只是许多从事产生这种外溢活动的国家之一。这意味着贸易政策可以是决定技术变革速度的一个重要因素。比如，外国通过补贴或者保护国内市场来“支持”高技术部门的发展，可能使美国一些确实对美国其他部门产生外溢的行业萎缩——这也许是考虑产业政策的国际影响的核心问题。

贸易特征的变化

贸易重要性的迅速提高，也使得另外一个变化引人注目。这一变化的重要性直到最近才开始被人们完全理解，这就是贸易特征的变化：贸易已不再是古典理论所设想的和现在的教科书中仍然在讲的那种交换。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把贸易看做是国家之间从彼此的差异中互利的一种方法。因为国家在气候、文化、技术、资源等方面的差异，每一个国家在生产一些对该国情况特别适合的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这种理论使人们认为，贸易主要是反映各国独有的优势产品之间的交换——比如发达国家出口制成品，而不发达国家出口原材料。

现在的情况是，国家的基本特征仍然主要决定国际贸易的基本模式。有熟练劳动力的国家倾向于出口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土地资源丰富的国家出口农产品，等等。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贸易的相当一部分（而且越来越多）不可简单地归因于出口这些产品国家的潜在优势；相反，贸易似乎反映的是来源于规模经济或在激烈的技术竞争中暂时取得领先地位而形成的没有规律的或暂时的优势。

为了理解这种转变，让我们看一下英国的贸易变化过程。我们不难看出，在古典经济学盛行的19世纪，国家的特征是如何决定英国的对外贸易的。英国由于拥有熟练的劳动力、充裕的资源和丰富的经验，在制造业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因此，英国主要出口工业制成品并进口原材料。然而，20世纪70年代，英国出口的主要是制成品，进口的主要也是制成品。即使再仔细研究贸易数据，也很难找到英国出口和进口的工业制成品有什么确定的模式。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非常相似的产品既有出口又有进口。

这种并无潜在比较优势的产品大量双向贸易的原因并不难找到：一方面是大规模生产的优势，而这种优势使国家之间的劳动分工基本上是随机的；另一方面是积累的经验所带来的优势，它有时使最初偶然的优势变成了永久的优势。还有就是创新带来的短暂的优势。重要的是，对贸易政策的传统经济分析所依据的贸易理论，并未考虑到这些引起国际分工的因素。正如我下一节所要讨论的那样，传统的贸易政策的结论可能因此已经不适合于当今世界。如今，这些因素对解释贸易和对我们更好地理解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都很重要。

我们还需注意到国际贸易中与此有关的一个变化：在那些导致国际分工的力量中，技术似乎显得越来越重要。在许多产业中，竞争优势好像既不是



由国家潜在的特征决定的，也不是由大规模生产的静态优势决定的，而是由公司研究与开发活动所产生的知识和经验决定的。但是，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技术革新是一种很可能会对经济中的其他部门产生重要外溢的活动。它在国际贸易中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加强了我们对贸易政策的分析基础进行重新思考的需要。

分析的新工具

导致贸易政策分析性质改变的最后一个原因，是经济学其他领域中的新思想在国际经济学中的应用。尤其是 20 世纪 70 年代产业组织领域的重大发展，出现了用于分析仅有少数几家厂商相互竞争的产业（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寡头”）的新方法。

大部分传统的经济分析是建立在市场不会偏离“完全竞争”太远的假设之上的，即在这种市场上有许多生产者，每一个生产者的力量都非常小，不会试图去影响价格或其竞争对手未来的行为。然而，贸易模式的变化明确地说明了该假设对研究贸易政策是不合适的。正如我们刚才提到的那样，现在相当一部分的贸易似乎是由大规模生产的优势、积累的经验所带来的优势和 innovation 带来的短暂的优势所引起的。在这些因素占主导地位的产业中，我们将难以看到众多小厂商之间原子状的竞争，而这一点正是用来描述“完全竞争”世界所必不可少的。在美国，像波音公司或卡特彼勒（Caterpillar）公司这样主要的出口商以及许多较小的厂商面临的竞争，与种植小麦的农场主以及服装制造商所面临的竞争是不同的。它们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竞争对手，并且都有某种影响价格的能力，它们做出战略性的行动，以图影响竞争对手的行为。

处于这种境况的厂商被经济学家称为处于“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这并不意味着竞争不激烈或厂商的行为有点反常，它只是意味着，在这些市场上所发生的事情不同，要比用简单的供给和需求概念所描述的市场复杂得多。换言之，这种不完全是经济学家的认识不完全，而不是真实世界不完全。

尽管我们的认识是不完全的，但这种情况正在改善。特别是最近的一些

重要研究工作已经有助于揭示出厂商的战略选择是如何受产业结构影响，以及战略选择又是如何反过来决定产业结构的。这些工作的最初目的是研究像反托拉斯、管制和创新政策之类的国内问题的。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的区别已经越来越不明显了。正是由于这些研究不完全竞争行业的工作，才使国际经济学家有了更多的工具来解决变化中的环境提出的许多问题。

因此，总的来说，重新思考贸易政策的分析基础，既是对实际环境变化的适应，也反映了经济学领域的知识发展。首先，贸易重要性的提高使我们有必要将历来被认为是纯国内的问题纳入国际范畴中来思考。其次，贸易特征的变化，即贸易不再是因为比较优势，而是因为一些更复杂的因素，要求人们重新思考传统的贸易政策理论。最后，经济专业理论的日趋完善，使得实际操作者们也愿意抛弃他们传统的但越来越站不住脚的简单化的假设。

然而，这一切将对贸易政策的实施产生什么不同影响呢？下一部分我们将讨论贸易思维转变的重要性。

贸易政策的新思路

支持自由贸易的传统观点

经济学家们呼吁自由贸易并非出于盲目的偏见，而是建立在一套具有严密逻辑的理论框架基础之上的。即便是那些已经开始改变我们对贸易的看法的新思想，也只是修正而非全盘否定这一框架。

支持自由贸易的观点自然只是支持自由市场的所有观点的一部分。尽管许多人对这个观点并不陌生，我们还是不妨在此扼要地复述一下。这一观点可以简述如下：除了失业问题——经济学家通常认为这是需求方面的问题，可以用货币政策来解决——之外，基本的经济问题是如何分配资本、熟练劳动力、原材料等稀缺的资源。资源的有限性使得人们不得不在各种活动之间进行选择。市场机制所提供的是一个分散进行选择的方式。市场机制并不要



求任何人明确地决定生产什么和怎样生产，它允许企业和个人通过价格机制间接地决定选择的优先顺序。

如今，大多数经济学家相信，通过这种分散化的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是十分有效的。在理想化的市场经济数学模型中，市场运作得如此完善，以至于很难对它再作改进。虽然大多数经济学家也承认这些模型过于理想化，但传统的观点仍然认为市场机制运行得很好。

这和支持自由贸易有什么关系呢？经济学家的这种观点的实质，就是认为进出口活动与其他经济活动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同。国际贸易可被看做是一个生产过程，在此过程中，一国相对便宜的商品被转化为较昂贵的商品。因此，就像其他经济活动一样，对外贸易也可完全交由分散化的市场机制去最有效地完成。

关于这个观点在技术上还需稍加限制。在某种特定商品上拥有巨大市场份额的国家，可以通过限制出口来抬高世界价格，从而使该国受益。没有人认为，实行自由贸易会使沙特阿拉伯比现在更富。然而，除此以外，传统的理论认为，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没有太大的区别。因此，一个让市场自行发挥作用的总体政策应该对这两个市场都是适用的。

在这一观点中还有一个不太准确的地方尚需特别强调。传统的自由贸易的观点并不因为其他国家不实行自由贸易而不成立。例如，假设世界小麦价格由于出口补贴而被压低了，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的理性反应应该是：减少小麦生产，生产更多的其他产品。如果澳大利亚政府允许事态自由发展，这种情况就会发生。对此，政府不应该有特别的干预。关于这一点，经济学家有一个古老相传的比喻：如果因为其他国家不实行自由贸易，我们也不实行自由贸易，那就好比因为其他国家有多岩石的海岸，我们也必须封锁港口一样。

诚然，传统的经济分析为自由贸易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支持，即便在一个其他国家都离自由贸易很远的世界也是如此。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传统的分析能否作为合适的研究贸易的框架，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下一个问题是，对传统分析的修改会使经济学家对贸易产生什么样的不同认识

呢？事实上，这整本书都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下面，还是让我们从一个简要的概述开始讨论这个问题。

新思想的含义

传统的支持自由贸易的观点部分地建立在理想化的理论模型之上，在该模型中，自由贸易可以被证明是最有效的。经济学家一直很清楚，如果抛弃了这些理论中的某些理想化的假设，市场有效的结论就值得怀疑了。然而，他们倾向于认为，这些理想化的模型可以得出基本正确的结论，偏离这些理想化模型的情况只是使分析稍微复杂了一点。传统的对市场有效率的信念，部分地反映了人们对现实的判断，但它也同样反映了人们还不具备精确地描述偏离完全市场会发生什么情况的能力。

贸易特征的变化和经济理论的深入发展，使人们再不能这样为自由贸易辩护了。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占世界贸易大部分的产业根本不能用供需分析来描述，供需分析认为，让市场自行其是是最好不过的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相当一部分贸易需要用规模经济、学习曲线和动态创新来解释，而这些现象都与自由贸易是最好的政策这一结论的理想化假设不相容。经济学家们把这些现象定义为“市场不完全”，这个术语本身就意味着存在着不同于理想化体系的状态。然而，在现实中，这种市场不完善很可能是普遍情况，而不仅仅是例外。

另一方面，分析工具的日趋改进，至少使一部分坚持完全市场假设的原因不能成立。15年前，经济学家还可以，也确实声称他们对不完全竞争在国际贸易中的政策含义知之甚少，几乎说不出所以然来。如今，虽然仍有很多不确定性，但经济学家们毕竟已能基本上洞察一些事情的本质了。

这些新认识是什么呢？现在出现的对贸易政策基础的重新思考，提出了两种认为积极的贸易政策可以比自由贸易更能使一国受益的方法，不过这会使其竞争对手承担损失。一种办法是通过政府政策使国家获得较大份额的“租金”；另一种办法是通过这些政策使国家获得更多的“外部经济”。第一个术语对经济学家和一般人有不同的含义；第二个术语在英语里根本就是没



有意义的。下面我们分别解释一下这两个术语。

“租金”在经济学中是指“某种要素所得到的高于该要素用于其他用途所获得的收益”。它可以是某个产业所获得的高于其他相同风险产业的利润率；或者是一个工人所获得的高于其他部门相同熟练程度的工人所能获得的工资。如果在某些部门中有重要的租金存在，则贸易政策可以通过让该国在产生租金的产业部门获得更大的份额来增加国民收入。

传统的观点认为，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经济中，租金非常少，所以到底是谁获得租金并不重要。如果某一产业的利润或工资非常高，资本和劳动就会涌入该产业，从而使这种超额利润很快消失。

如果贸易的新思路是正确的，重要的贸易部门就应是那些租金不会轻易因竞争而消失的部门。例如，如果存在大规模生产的优势、比较陡的学习曲线，即使该产业中现有的企业能获得高额利润，支付高工资，或二者兼而有之，新进入的企业也难保证有利可图。

一旦我们相信某些部门确实存在大量的租金，那么至少从原理上讲，就有可能通过贸易政策使本国获得更多的租金。比如，假设某些产品的世界市场可以容纳两家都能获得高额利润的厂商，但若有第三家进入，利润就会消失。在这种情况下，结局只能是这两家厂商获得相当多的租金，而无法通过竞争使租金消失。显然，每一个国家都希望本国的一家厂商成为这对幸运儿中的一个。从常识中我们知道，一国可以以他国的利益损失为代价，通过保护或补贴政策增加本国租金的份额，提高其国民收入，现在这一点已经从理论上得到了证明。

外部经济则为采取积极的贸易政策提供了另一个依据。经济学家所称的“外部经济”，是指一些个人或厂商从其他从事某种经济活动的个人或厂商那里获得的收益。其中最可能的例子，就是某一领域产生的知识扩散到其他厂商和部门。虽然外部经济和租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它也为实行扶持某些部门的政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由。在这里，主要问题不是这些部门的资本与劳动获得了高额回报，而是它们为社会创造了高额回报，因为除了它们自己的收入之外，还为社会其他部门的劳动和资本带来了收益。